

辛亥百年  
名家经典导读

# 梁启超

LIANGQI CHAO SHI WEN XUAN

诗文选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他批判封建旧学，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发民智，在当时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

主编 戴逸 注译 马金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名家经典导读

# 梁启超诗文选

LIANGQICHAO SHIWEN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马金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诗文选/马金科注译. —成都:巴蜀书社,  
2011. 5

ISBN 978 - 7 - 80752 - 811 - 1

I. ①梁… II. ①马…… III. ①诗集—中国—  
近代 ②散集—中国—近代 IV. ① I 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370 号

## 梁启超诗文选

LIANGQICHAOSHIWEN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马金科

责任编辑 陈礼  
封面设计 张科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 行 科 028—86259422 86259423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1mm×225mm  
印 张 14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2 - 811 - 1  
定 价 23.00 元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028-84122206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杨东梁 段志洪

# 序 言

戴 逸 杨东梁

十四年前，我们曾编辑过一套《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共 39 册，由巴蜀书社出版。当时，我们诚邀了十几位在京的文史专家和出版社的几位高级编审组成编委会，同时，约请了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共同成就了此套丛书。

之所以要编辑该丛书，是要让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更多地了解一点近代中国人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富国强兵之路，寻求救国、救民之途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在祖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中华民族逐渐觉醒，奋起抗争。许多仁人志士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独立、民族复兴呼啸着前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中国近代文学就充分突出了爱国主义这个主旋律，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跨过道道难关，迎来光明的前程。而今天的青年人既没有一百多年前那种举步维艰、风雨如磐的感受，也缺少较为丰富而形象的近代历史知识。阅读近代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则可以引领他们进入那个逝去不久的时代，聆听其心声，体察其情感，品味其所思所求，从而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那段路程。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事件，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完全意

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开辟了道路。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与巴蜀书社商定，从《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选出十二种，分别编成两套丛书：一套冠名为《辛亥百年——名家经典导读》，共收六种，即：《孙中山文选》、《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诗文选》、《辛亥烈士诗文选》、《章太炎诗文选》、《康有为诗文选》、《梁启超诗文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献出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遗著，其中不乏思想深邃、语言犀利、富有文采的名篇佳作。

黄兴、宋教仁、朱执信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是革命党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们或因操劳革命，英年早逝；或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为宪法流血”第一人；或极富理论才华，却惨死在军阀屠刀之下。他们的诗文都有强烈的爱国、战斗精神，但其艺术风格却不尽相同，或慷慨悲壮，或清新淳朴；或奔放，或含蓄；或犀利，或深邃，因人而异，各具特色。

我们还选收了三十多位辛亥烈士的诗文遗作，这些烈士具有坚定而高昂的革命斗志，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们把生命的价值与祖国的富强、同胞的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其诗文有的是临阵发出的誓言，有的是临刑留下的遗篇，真可谓声声血泪，句句铿锵，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一页。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说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那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尖锐地批驳了保皇派的谬论，酣畅淋漓，脍炙人口。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面广，于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诸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语），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他晚年虽脱离民众，渐入颓唐，但也不过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

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但在辛亥时期也是政坛和思想界的活跃人物。他们宣传保皇，反对革命，追求君主立宪，与革命派进行了激烈辩论。把康、梁的诗文收在《辛亥百年》丛书中，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辛亥时期涌动着的不同思潮，展现出的不同政治主张。须知，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更何况康、梁也曾经位列中国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中，也曾一度领舆论之风骚，只不过当时代继续前进时，他们未能追上潮流，成了落伍者。

另一套丛书冠名为《强国之梦——近代名文导读》，共收录了《近代实业文选》、《近代法制文选》、《近代教育文选》、《近代报刊文选》、《近代经世文选》、《近代名人日记选》共六种。这是从文学体裁角度入手，选编近代仁人志士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发出的声声呐喊。

振兴中华的有志之士围绕如何使中国转弱为强的现实问题，提出“兴实业”、“振商务”，学习西方。有人更身体力行，将“实业救国”论付诸实践；近代的爱国者在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上，还提出了改革政治及法律制度的种种主张和方案，推动了中国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进步；至于教育，更为历代中国人所重视，时至近代，有人甚至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资产阶级革命家则提出“革命之教育”，把中国教育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近代报刊也在中华大地上勃然兴起。开始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

纸，至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他们鼓吹以西学为师，变法图强。甲午战争后，办报形成热潮，并成为传播启蒙思想，宣传救亡图存的锐利武器。辛亥之后，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有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此外，由于报刊文具有时效性、纪实性和趣味性，自然得到读者的青睐，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说到近代经世文，顾名思义则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产物，它宣扬进化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标榜“采西学”，开风气，睁眼看世界，力图为纠封建末世之“时弊”而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近代名人日记涉及近代一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且往往是亲历亲为，可作为其他史籍的佐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再则，有些日记出自文学名家之手，更显得细腻生动，文采斐然。

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编辑这两套丛书，一是出于巴蜀书社的积极推动，二是有诸多作者的大力支持。由于巴蜀书社的编辑先生们精心策划，反复推敲；各位作者兢兢业业，认真修订，终于得以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将两套面目一新的丛书奉献于读者面前，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在我们今天重温旧章之时，其中两位作者——桑咸之教授、林庆元教授却已驾鹤西去，这让我们唏嘘不已，悲痛系之！两套新版丛书的推出，也是对他们的纪念吧。

2011年4月于北京



## 前 言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派思想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自幼聪颖过人，曾入广东学海堂学训诂词章。17岁考中举人。18岁入京参加会试，落第回乡时路过上海，读了《瀛环志略》及江南制造局译出的西书，开阔了眼界，开始注意世界形势，由此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对自己在广东学海堂所学的汉学进行反思。这年秋天结交学海堂的另一高材生陈千秋。他们相约去拜谒因1888年上书皇帝而闻名于世的康有为。在初次谈话中，康有为对梁启超所推重的训诂词章之学一一进行批驳，使梁启超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竟夕不能寐”。他决心放弃训诂词章之学，从师于康有为，成为康的入门弟子，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学习时期，帮助康有为编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协助康有为组织、发动“公车上书”。同年，康有为在京师发起组织“强学会”，梁启超为书记员，参加《中外纪闻》的编辑工作。次年，任《时务报》撰述，撰写《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为戊戌变法起了重要宣传鼓动作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应黄遵宪约请，去湖南，任长河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在学堂内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出一批优秀学员，如蔡锷、林圭等人。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时期，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冬天，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君主立宪，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清

议报》共出 100 期，因火灾停刊，又继办《新民丛报》。在继续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同时，还积极提倡爱国主义，开发民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这时期重要论著有《戊戌政变记》、《过渡时代论》、《自由书》、《少年中国说》、《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新民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至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梁启超等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民报》展开了论战。梁启超反对推翻清政府，对清政府的立宪抱有幻想。在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不断壮大，社会思潮的主流已经由变法维新转向民主革命的情况下，《新民丛报》不得已而停刊。此后梁启超又积极从事立宪的政治活动，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相呼应，他在日本组织“政闻社”，并将总部迁到上海。然而，清朝统治者仍视梁启超为“叛逆”，而它本身也并无立宪诚意。此时，梁启超虽然无比愤懑，但仍继续支持国内立宪派的请愿运动，还撰写了《王荆公》与《管子传》，以肯定改革家的历史地位。1910 年《国风报》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任总撰稿人。该报是继《新民丛报》之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1912 年（民国元年）冬经与袁世凯多次联系，决定与袁合作。回国后，先后任共和党、进步党首领，并积极向袁世凯出谋献策。又曾短期出任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揭露袁世凯的野心，指出恢复帝制是自取灭亡，同时支持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不久，又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合作，1917 年（民国六年）参与反对张勋复辟。1918 年（民国七年）脱离政界去欧洲访问，列席旁听巴黎和会。回国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此后主要从事著述，提倡整理国故，也介绍西方当代哲学思想。后期的代表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历史统计学》、《五十年来进化概论》、《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

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1929年1月因病逝世，享年56岁。

梁启超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905年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可算是“言论界骄子”。此时他先后办过三份报纸（《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积极鼓吹变法维新，成为当时著名的宣传家。他批判封建旧学，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发民智，在当时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他批判旧史学，提出新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还提出整理研究历史文化遗产，初步论述了批判继承问题。他对问题涉猎之广，著述之多，在同时代很难找出第二人。

梁启超是一个勇于反省自己的人。他曾说自己治学的毛病是博杂而不精深。有人认为他的文章不如严复专精典雅，不如章太炎深邃古典，但是梁启超的文章比严、章等人，更能获得青年人的欢迎。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曾说：梁启超“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人”。严复也说过他的宣传鼓动性文章对促进清朝覆亡是有作用的。

梁启超曾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苟有所进，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他的观点和政治主张几次发生变化。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国外与康有为打起了保皇的旗帜。他曾高唱“破坏主义”，后来对慈禧太后所颁布的预备立宪又抱有幻想。他积极主张君主立宪，但又提出“开明专制”。他曾寄希望于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排挤过革命党人，但在袁世凯称帝时，他支持蔡锷发动了反对袁氏复辟的护国战争。“五四”时期，他说：“我很盼望最近的将来，有真正的国民运动出现。倘若有么，我梁启超应该使我的舌头和笔头来当个马前小卒”。可是当工农革命兴起时，他站到了反对的立场。梁启超的多变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从客观来看，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从主观来看，是梁启超在不断地追求一个能推进中国进步的政治模式，只是由于其阶级的

局限性，使他无法找到一条真理之路。尽管他晚年说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梁启超终其一生是一个爱国者。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是一个热烈执着、充满生活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尽管他不能冲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樊篱，但他已认识到局限所在。他说：“自己发现了一个罪恶就是：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的，或不愿共事的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身上一直存在着那么一种追求前进的真情。

梁启超在文章和书信中曾提到自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往往在文论中流露出一种激情，所以，他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他曾说过，当他阅读龚自珍的文章时“若受电然”，进而又感到自己文章的浅薄。同样，梁启超的早期文章充满激情与鼓动性，但也往往失于不够深刻。在译述他的文章时，如何将他的精神情感译出来是有一些难度的。

梁启超一生从事很多政治活动，同时也是著述等身。有人统计他的著述约有1400多万字（这个数字估计是偏低的），内容包括了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财政学、伦理学、经学、佛学等。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文字通顺流畅，生动活泼，是“新文体”的倡导者。梁启超的文章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宣传鼓动性很强，对社会震动很大。在学术著述中也往往充溢着政治气息，优点是不躲躲闪闪，直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有人曾评论他的文章是“骨子里常带政治气味”。由于梁启超著述影响很大，在他生前即有人为他编文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何擎一（天柱）编《饮冰室文集》，此后30多年内，大约有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问世，其中以1936年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最为完备。

梁启超的著述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至戊戌变法时期，他受康有为疑古思想与今文经学思想影响较大。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时务报》创刊后，是他这一时期写作的高峰期，如《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古议院考》等文，大多依据初步的进化史观和今文经学观点写成。本书中所选录的《变法通议·自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梁启超从地球的形成到人类社会的产生，论述了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阐明变革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理，他历述了中国历史上官制、兵制和赋役制度的演变，证明“变亦变，不变亦变”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而且警告说，如自己不变法，别人就会来替你变；守古不变，国家就没有前途。这些论述在变法维新时期，其震动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文章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这时期的著述大多表现出年轻气盛，宣传鼓动性强，敢于下结论，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尚处在新旧转换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生搬硬套的毛病。如《古议院考》中，梁启超将汉武帝时选用一批官秩较低的官吏组成“中朝”为皇帝办事，说成是早期的议院，这种简单的援古议今是当时维新派的通病。严复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曾致信梁启超指出了他的不确切，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翻译的《天演论》。本书中所选的《与严幼陵先生书》就是梁启超的复信。他一方面接受了严复的批评，但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并且在字里行间还透露出一种少年得志的情绪。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后，梁启超在日本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他看以往从未见过的书，从未听到的理论，真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他说自己不想将这些“开民智”、“强国基”的知识据为己有，所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每当他看过一本书，了解到一种思想后，便立即通过《清议报》与继《清议报》创办的《新民丛报》进行介绍和宣传。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关心和热切

期望，同时也表现了在异国他乡的惆怅心情。1899年至1905年（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正是梁启超从一个热血青年进入而立之年的时期，这时期的著述说理性较强，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比较深刻，既有热情激扬的文字，又有对祖国前途的深沉思索和期望。本书以选录这时期的文章为重点，如选录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新史学》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因为《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新史学》文章长，内容多，选录时采取了摘选的办法。这一时期，虽然梁启超仍坚持改良的政治主张，但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广，对某些问题的论述是很有创见、很有深度的。本书摘选的《新民说》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梁启超对“新民”的含义，解释是要有民族精神的国民。所谓民族精神并不是固守旧习，而是要吸取外来优秀的东西，不断更新自己。既不要像“心醉西风者流”，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而盲目学习他人。又不要像“墨守成规者流”，死抱着旧传统，拒绝吸收外来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自新，才能前进。他还提出了“公德与私德”、“权力与法制”、“自由与克制”等问题，论证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今天看来，他的言论参考价值仍然存在。又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写的《新民议·禁早婚议》一文中，实际提出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优生优育问题。梁启超在论述中虽有个别不当之处，但从文章的总体来看是论述改变封建陋习提高人民素质的问题。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素质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20世纪初，梁启超将其作为“新民”的重要内容提出是有眼光的。另外，从《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热切地期望国人都来关心国家命运；有激情的陈述，也有辛辣的讽刺。除此以外，还选了他对学术思想发展和史学评论的看法，虽然认识还不算深刻，但反映了与旧传统思想不同的新观点。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后，由于梁启超忙于与革命派进行论

战，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后又进行了立宪的活动，这时书信较多，具有代表性的长篇著述有《王荆公》、《管子传》，目的是为历史上的改革家鸣冤，颂扬其改革成就，肯定其历史地位。在这一时期，选录了一篇散文《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这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散文形式的墓志铭。梁启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黄遵宪一生的事迹，重点突出了他在外交方面、维新活动中的成就，以及在“诗界革命”中的贡献，是黄遵宪死后最早全面介绍他的文章，为后人研究黄遵宪提供了很好的素材，铭文写得也很生动。

1912年（民国元年）后，梁启超曾经在熊希龄内阁中担任过司法总长。这时期他比较注意立法与财政问题，写了几篇有关这些方面的文章，但具有代表性和产生较大影响的著述是《欧洲战役史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本书摘录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的大部分内容。梁启超批评了“筹安会”中某些人怂恿袁世凯复辟，轻率地决定变更国体，指出复辟帝制会使中国丧失希望。同年，他在致袁世凯信中更提到“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梁启超采取了劝诫、揭露、指责并举的方式，说理性较强，层次分明，文字跌宕起伏，可读性很强，既是一篇政论文章，又是一篇好散文。

1917年（民国六年）底，梁启超辞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职务后，大力研究碑刻、金石，撰写了不少跋文。本书中所选录的《秦琅邪台刻石》一文，即此时期颇具新意的一篇。他从秦始皇刻石颂功，李斯篆字的珍贵与琅邪台刻石坠海后联想到帝制的结束，在短短一百多字中写得很有起伏感，并发人深思。

梁启超的欧洲之游与欧游归来直到逝世，是他思想的又一变化时期。他介绍了西方当代哲学思想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以詹姆士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他以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写了一些有关著述，例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地理与年代》等篇中

都强调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的变化中观察历史的因果关系；又强调“自由意志”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同时还提出“心力”与“物质基件”相应社会才能发展等。梁启超在后期还提出“整理国故”，与胡适竞相拟出古书阅读书目，研究儒家思想，旁及老庄、法家、墨子等。他的后期学术著述很多，思想也比较复杂，对其著述思想的评价与历史地位，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所以本书一般没有选录。考虑到为了解梁启超后期的散文特点与生活情趣，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仅选了《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美术与生活》两篇。

在诗词方面，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积极倡导者。他曾赞赏夏曾佑、黄遵宪以新思想、新词汇熔铸诗中，将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称为“近世世界三杰”。梁启超的诗受上述人影响，在初期的词诗创作中不过分注意格式，热情奔放，通俗流畅，直抒胸臆，忧国忧民思想充溢诗中。后期诗词功力渐深，用词方面也趋于典雅，往往采取比拟的手法抒发情感，反映了思想的深沉。本书所选的《和夏穗卿》一诗反映了在戊戌变法前忧愤时局的心情。《去国行》、《志未酬》、《爱国歌四章》、《壮别》，与词作《水调歌头》、《贺新郎》都代表了初期的诗词特点。《东归感怀》、《归舟见月》与词作《浪淘沙》代表了功力趋于成熟，讲究用词与典雅的表达方式。

梁启超的著述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又很广，他的诗文选集也已出版很多，要想出一本理想的诗文选，编者确实感到难度很大而且力不从心。现在，在主编与专家的指导与帮助下，编出了一本《梁启超诗文选》。希望读者能从这本诗文选中得到教益，也希望提出宝贵的意见，以期进一步完善，使更多的人了解前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在编译过程中得到龚书铎、李侃教授的大力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 目 录

前 言	/001
变法通议·自序	/001
变法通议·论师范	/006
“保国会”演说词	/015
祭六君子文	/024
少年中国说	/028
呵旁观者文	/042
新民说·释新民主主义	/057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062
新民议·禁早婚议	/073
新史学·论书法	/091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总论	/102
嘉应黄先生墓志铭	/112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节录）	/121
祭蔡松坡文	/147
秦琅邪台刻石	/152
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	/154
美术与生活（一）	/158
与严幼陵先生书	/162
与仲弟书	/175